

重庆文史资料

第四十一辑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 录

俯首为牛 肝胆相照

- 缅怀裴昌会 赖西菱 (1)
- 忆裴昌会 刘元瑾 (11)
- 起义前后的裴昌会 张永龄 (14)
- 深情忆诤友 孙先余 (21)
- 难忘的回忆 鲁崇义 (25)
- 记裴昌会生前二三事 胡永僇 (29)
- 追求真理 风范照人 张忠惠 (32)
- 悼念裴昌会 王文彬 (37)
- 尊敬的抗日将领和起义将领

- 深切怀念裴昌会副主席 朱敬平 (39)
- 难忘的教诲

- 忆祖父裴昌会 裴丽珍 (61)
- 难以忘却的怀念 沈锦珍 (66)
- 十年沉冤 一朝平雪

- 缅怀裴昌会的高风亮节 廖广扬 曾永遐 (70)
- 怀念刘宗宽 韦思琪 (74)
- 追忆刘宗宽 秦一民 (76)
- 悼念刘宗宽兄 王文彬 (79)
- 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刘宗宽 李宗杰 (83)

- 毛蒋林园握手 王抡樞 (99)

2A43/57

桐花陪都翻新曲	尚 丁 (100)
黄炎培在陪都的咏萃拾遗	王景瑜 乔繁昌 (104)
张澜与罗瑞卿	沈志强 (106)
追忆夏仲实	彭 兴 (109)
共产党人在黄埔	张 谦 (115)
康泽事略	陈开国 (118)
海明威的重庆之行	杨耀健 (133)
中央林业实验所在陪都	黄侃如 (136)
重庆搪瓷史话	於福海 (140)
重庆鞋帽工业的形成和发展	张志凡 (153)
北碚钢铁厂建厂记要	郑体思 (161)
唯一电影院史话	刘蜀仪 (165)
藏传佛教在重庆	甘文峰 (169)
益社始末	鹿佑珣 (173)
重庆战犯管理所概况	孙 曙 (194)
鹿角战俘营琐记	李 丛 (213)
重庆文化界救国联合会的三个历史时期	陈志坚 (217)
重庆“四·二一”游行侧记	何江平 (224)
重庆市聋哑人福利会成立前后	陈未云 (232)
重庆南开中学的学生办报热	樊元武 (235)
解放前永川钱摊业小史	宋君良 (237)

关于《发起嘉陵三峡博物馆题名》 胡昌健 (241)
霜叶红于二月花

——论凌文远的诗 沙 鸥 (243)
舞姿何婆娑

——读万龙生诗集《“戴镣”之舞》 王群生 (257)

政协重庆市第十届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成员名单 (260)

俯首为牛 肝胆相照

——缅怀裴昌会

赖西夔

早慕大名 儒将风度

1949年11月中旬，我在任四川地下党临时支部组织领导的川西保卫军总部的联络员时，曾听郭勋祺说过裴昌会，他们相识于抗战时期，裴现任胡宗南部副长官，为人豪爽坦率，很有正义感，当时裴就认为老蒋摆二十多个师在陕北守住共产党的部队，放弃抗战任务是不好的。郭还给裴写了信，希望能相机起义。到1950年初，贺老总（贺龙）在成都东胜街沙利文礼堂召集成都市各界代表座谈会，我以地下民革川康分会执委身份参加，经郭勋祺介绍认识了裴昌会，把久已闻名的裴老尊驾联系上了。

裴老与郭勋祺见面，又扯起往事，裴老说：“你的信我收到了，由于我的部队已有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联系，所以没有回信，希望原谅。起义时我部有一些部队不听我的约束跑了，很感歉然。”郭勋祺说：“你通电起义就很好，我们向你祝贺！”我与裴老也谈了一会儿，他给我的印象是对人和蔼可亲，言谈风雅，是国民党军人中少有的具有儒将风度的高级将领。

协助工作 安置流散

成都市各界代表座谈会结束时，裴老向贺老总建议，把胡宗南、顾祝同逃离成都后遗留的国民党参谋本部及西安绥署所属的流散官兵清理登记，加以安置，以免扰乱社会秩序。贺老总当即

同意，派员会同裴老指定的西安绥署人事处长李德庵，进行清理工作。清理中，总计登记了 3000 多名官兵，还把清查出的电台及零散武器弹药交给了当时的军管会。裴老根据贺老总阐明的党对国民党起义投诚政策，协助军管会分别安置了流散官兵；如国民党中将冀某某和少将高参官某某等都在以后安排为省参事、省文史馆员等职务。

此外，1950 年 2 月初，国民党中流散的军警宪特在成都市郊区组织骚乱，以及国民党军中少数起义部队在广汉县叛变时，裴老与解放军派驻该部的代表密切合作，严令所属遵守纪律，率领部队按照党指定的地区开拔，未发生大小事故，这对稳定起义部队的军心，安定社会治安，起了很好的作用。

畅谈起义 铭感信任

1953 年夏，民革中央组织部长朱蕴山到西南视察党务过重庆，我应电邀由成都到渝汇报工作。一天，朱老约裴老（时任西南纺管局局长）去范庄招待所便餐交谈，我亦在坐。裴老谈起他起义的情况：抗日战争后期，胡宗南欲做“西北王”，利用我对西北军的影响，要我担任胡的副手，实际上没有实权。如 1947 年胡进犯延安，我被指定负责前进指挥所，但部队行动仍由胡亲自部署，刘戡那个军被解放军吃掉了，我是事后才知道的。还有 1949 年胡从西安撤退时，对我做出亲密姿态，同我吃血酒、结金兰，说老蒋以西南为复兴基地，正是创功立业之时，要我担任后卫，并指定我到四川后，固守川北地区防务，实际上拨给我指挥的都是待整补的空架子军，有的军背地与胡有密切的联系，所以起义时李振西的一个军和另一个师则跑掉了。胡本人则把精锐装备完整的几个军交给李文指挥。事实虽然如此，但我站在与解放军敌对的立场来说，对进犯延安之事，是不能辞其咎的。因此，起义后我内心十分不安，这种心情直到 1950 年夏去北京列席全国政协

一届二次会议，受到毛主席的单独接见时，毛主席以宽大的胸怀，一再说明党对起义人员既往不咎，对我率部起义有所嘉许，才放了心。

以后我被安排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派去川北行署任副主任兼工业厅长，在胡耀邦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胡耀邦一见面就对我说：“你起义了，就是从政治上转过来了，我们党不但欢迎，而且希望你今后和我们很好合作，除了抓好工业厅工作外，还以副主任职务兼管交通、农林等方面的工作”。并十分关切地明示我：“党是相信你的，现在刚解放，工作很多，很繁忙，你就鼓起劲干，再创新功。对进犯延安的历史，毛主席已作了既往不咎的指示，你就不要背什么包袱，今后也不要不分场合的自责检讨，工作威信还是应当保护的。”我说：“自己是一个旧社会的职业军人，新担任行政工作，可能不称职。”耀邦说：“这有何难，我们也是从战争中学会打仗的，不懂就学，向人民学，向基层学，有党的政策为准，有事多同各级党委商量，工作是会做好的。”

胡耀邦这番亲切而诚挚的谈话，使我几乎掉下了眼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度量宽，有魄力，站得高，看得远，生活简朴，诚恳待人，办事认真，不装腔作势，如此高洁的风格，是深得民心的。由此可见，中华民族的振兴大有希望，我选择起义的道路是对的，甚感心情舒畅，从而激发了自己下决心认真学习、努力工作的积极性。以后我在参加土改、参加政权建设过程中，又学了不少新东西，特别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教育。今天才知道共产党号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一切政策制定的出发点，都不能脱离“民为邦本”的精神意义，国民党欺压人民，焉得不败。

1951年胡耀邦推荐我筹建川北地区民革组织，要我多接触各界人士和群众。听取他们的意见及时反映、沟通情况，增进党和各界人士的互相了解。我了解到一位曾在抗战时期任过王陵基集团军军长的韩全朴，此人与王意见不合，抗战中期离开王部，1948

年王陵基任四川省主席时，韩也没去投靠谋取职位，却返回南充桂花场家乡闲居，据韩的同事说，韩早年与刘伯承有交往，韩虽未起义，也未附和王陵基，他在四川地方军界中还有一些影响。我如实向胡耀邦反映后，韩全朴被安排为川北行署参事，对此各界人士称赞共产党统战工作的正确，我自己也铭感党的信任。

1955年夏，成都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在成都召开授衔授奖典礼大会，裴老同刘文辉、邓锡侯等都受到了中央颁发的“一级解放勋章”。裴老在民革四川省委召开的庆贺座谈会上说：“我是临全国最后解放时才在四川起义的，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共产党仍不漠视微劳，发给奖章，真使人愧感交集，只有认真搞好工作，才能答谢党和人民的厚遇。”

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

1958年初冬，我和罗承烈随同四川省民革主委刘文辉去重庆视察民革工作，裴老时任重庆市副市长和民革重庆市委副主委，时值民革在成都“集中整风交心运动”之后不久。刘文辉为认真贯彻党和毛主席提出的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邀请在渝的民革中委、候补中委和部分民革重庆市的领导座谈。在这个会上，裴老首先发言，强调民革内部必须团结，清除旧军政人员中的派别观念。表示自己虽没在四川军队里呆过，不了解情况，但已解放八、九年了，外省的、其它部队的都因起义或参加革命工作，不期而遇，走到一起来了，党安排我们工作，都有事可干，都有施展自己能力的机会，就应该互相勉励，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才对得起党的宽遇，才有条件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在谈到工作中有职有权的问题时，裴老说：“我这个副市长是有职有权的，我分管的工作，不管是不是党员干部都向我汇报请示，自己也有责任，也要认真学习党的政策，领会精神实质，不

能随便胡说乱批，做到有职、有权、有责。党和政府是欢迎这样的干部的。”由于裴老的坦率发言，促使座谈会开得很和悦成功，起了团结的作用，得到刘文辉的称赞。

裴老在强调民革内部要团结的同时，还注重关心爱护机关干部的生活和健康。1964年冬，我和裴老在北京参加民革中央委员会时，裴老对我说：“郭因是（民革重庆市委机关干部）可以说是积劳成疾，太辛苦了，我向夏老（夏仲实）商量，关照医生用好药，尽力治疗，但因患的是不治之症，无法挽救，可惜早逝了一个好干部，对他逝世后的家属安排，我同夏老都向市委统战部商量，作了妥善的解决。我望你要保持身体健康，你是子女较多的父亲，家庭生活和工作一定要安排好，注意劳逸结合”。我听后十分感动，深谢裴老对干部的关心爱护。

文革披难 信仰弥坚

1977年12月底，裴老带病参加四川省政协会议到成都，我去银丝街招待所看望，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说：“幸会！幸会！不想我们还有机会见面。”我说：“早听说你受冲击很大。我在干校劳动，两次从悬崖滚下，幸未跌死，也未重伤，也是很幸运的。”他说：“我开始受屈辱待遇时，思想很不通，曾暗地怀疑这种做法不是党的政策，后来看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解放军老帅都受冤屈，有的还被整死，联想自己又算得什么？何况还活着，内心就坦然多了。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召开，我被提名为人大代表，更使我感到党的正确政策恢复了，统一战线还是要的。所以我在北京开会期间，不顾禁条，去胡耀邦家看望，他爱人和儿子都说我胆大，这个时候还敢来！我说我绝对相信耀邦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有什么怕的。我自问从旧军队转向革命阵营，一开始就在耀邦的领导下工作，合作共事的时间虽不长，受益不少，可以说他是我参加革命的引路人，不管什么风险，都不能忘记他诚挚

待我的知遇之情。我有一事想同他商量，我想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以表我真诚跟党到底的决心。耀邦说我的意愿很好，可向重庆市委统战部送申请，由部转交中央审批。”裴老当即决定回重庆后就写入党申请书。

1979年初秋，各民主党派中央在北京分别召开代表大会，我与裴老又在京见面。裴老听了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向参加各民主党派会议的全体代表讲话后，在小组会上说：“小平同志重申党的统一战线不但不能削弱，还须加强，不但不能缩小，还须扩大，在肯定民主党派几十年合作的同时，并号召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希望各民主党派同心同德，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和繁荣昌盛贡献力量，这话是对‘四人帮’否定党的统一战线是法宝的纠正，我们民主党派大有作为，和祖国的前景一样，我坚信是美好的。”这次民革中央代表大会，裴老被选为民革中央副主席。

1980年春，裴老被选为民革四川省委员会主任委员，我被选为副主任委员，会后他对我说：“在北京开完民革中央代表会后我兴奋极了，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又去见了胡耀邦，表示了要求入党的志愿。我回重庆后已写好申请邮寄出去了。不管结果如何，我的余年一定要为党的事业、祖国统一、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发展竭尽全力。”

积极领导 关怀入微

1980年初，正值各省级民主党派正式开展活动之时，从四川省民革来说百端待理。裴老力主先在各级组织认真学习邓小平对各党派中央代表讲话的精神，向群众阐明其实质，在社会上扩大党的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的影响和作用、地位、任务的宣传，然后在此基础上积极与有关方面联系，协助基层组织恢复活动。同时着手调查了解，逐步开展组织发展工作。他特别强调：我本人

因住重庆，不可能经常来成都，民革省委的工作，日常具体事务由罗承烈、刘元璋全权负责处理，重大问题，请在蓉的副主委、秘书长协商，然后直接向省委统战部商量办理。由于裴老坦诚的领导作风，促进了民革省委领导层的团结，调动了干部的积极性，工作日趋活跃。

1980年12月，裴老赴京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我被省民革推荐参加四川省委统战部和四川省政协联合组成的落实党中央6号文件领导小组，并兼办公室副主任职。我在长途电话上向他请示工作，他说：“我完全同意和支持。希望你们认真落实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他们中有不少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有的家属也受牵连，使党的威信受到影响。党拨乱反正，纠正过去由极‘左’思潮造成的冤假错案，是维护党的正确政策，深得人民群众内心拥戴的大事，一定辛苦点，把政策落实好。属于随我起义人员，如有需要向我了解情况的，只要通知我，是会如实证明的。”

1982年夏，我同全国政协了解落实6号文件情况小组到重庆，特地去裴老家汇报，他高兴地对我说：“你们的工作做得不错，全国政协工作组的人对我说，四川落实政策的工作做得好。四川需要落实政策的人多，工作量大，在你们的努力下已基本落实，只剩扫尾工作，足见你们工作出色。听说剩下的案子属老大难，这就需要你们坚持党的政策原则，该落实的一定要落实，顶住不办的，可报请上级批示，必要时我可以去中央呼吁，协助问题解决。最近胡耀邦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对党的统一战线理论阐明得更深刻，特别把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又加了八个字，叫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合起来就是十六字方针，使人听了倍受鼓舞。这概括了党与民主党派的历史事实和现实关系，是非常恰当的。有了这个讲话，党的各级组织将更加重视统战工作，民主党派的工作也会好做得多。我们民革要

组织干部和成员认真学习，领会精神，向群众宣传，并迅速进行组织发展工作，特别要着重发展中青年有专业知识的人士参加，只有这样，民革组织才会后继有人，才有生气，才能发挥民主党派联系上、中层知识界人士，团结在党的周围，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的作用。因此，现在落实政策的范围已扩大到整个统战方面，这是党中央的英明，也是巩固和扩大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重要措施，统一战线的黄金时代已开始了。请你回去后向承烈、元璋转致我的意见，省民革的事偏劳他们，我向他们表示感谢。”

裴老不但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为起义人员的落实政策做了大量的工作。他还就近参加民革重庆市委组织发展成员的座谈会及支部活动，并进行调查了解，选择有专业知识的人才向民革中央推荐，为改变民革中委老化状况作了一些准备工作。

80年代初，裴老在省民革工作期间，曾了解到省民革一老夫妇已过古稀之年，子女却均不在身边，他主动协助这位老同志写申请，亲自交胡耀邦批准，将在外省工作的女儿调回成都，解决了照顾父母生活的问题，一对老人得享天伦之乐。

“文革”后，在修复抗日阵亡将领李家钰的坟墓问题上，党内外有少数人持异议，一时难于肯定。裴老仗义直言，就他与李部同属第一战区序列的同事关系，向有关方面证明李将军所部是在陇海线上固守阵地、阻击日寇进犯、完成任务后奉命转移中，受到敌人侧击阵亡的。当时第一战区长官部举行了隆重的临时追悼，随即报国民政府请予表彰优恤。李将军在第一战区是受人尊敬的抗日将领。1979年落实政策时，即据此由成都市民革主办修复了李墓，1985年纪念抗日战争40周年时，由省政协、省委统战部主办再度修整了李墓。

出力统一 沟通内外

裴老 1984 年到成都参加省人代会时，我们曾谈及祖国统一的大事，他对我说：“自 1979 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后，接着邓小平、叶剑英、廖承志等领导都先后明确地阐述了我们对祖国统一的主张、政策和原则，说明我们对台湾国民党当局和同胞的态度是十分和善的，主动伸出了言和之手。特别是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用和平方式实现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更是合情合理的上策，所以我致信蒋经国，希望他不要错失良机。”据我所知，裴老致蒋经国的信，是从裴老在参加蒋、冯、阎内战中，曾亲率一个加强团兵力在陇海线的一个车站上突击解危，救出过蒋介石的往事谈起，建议蒋经国抛弃前嫌，遵循孙中山先生主张国共合作的遗愿，以民族团结共同振兴中华为重，与中国共产党实行第三次合作，完成祖国统一事业，才是留芳万世的殊荣。

此外，据我所知，裴老每到北京开会，都要抽出时间去看望胡耀邦，除了谈谈自己和反映所接触的群众思想情况外，经胡耀邦同意，裴老还约邀了四川的李振、鲁崇义、周钦岳、赵子立等人，去胡耀邦家反映所接触群众的情况。裴老说：“耀邦同志以这种家庭小型闲谈方式了解情况，使大家无拘无束，没有压力，谈得很深刻。耀邦同志每次都要作一些政策性的解释发言，大家都感受教益，确实增进了党与非党人士的相互了解。”

以上是我从 50 年代起，结识裴老所见所闻的一些往事，由于裴老常驻重庆，我们不能经常见面，很难表述全貌。我从与裴老亲近中，特别是他担任四川省民革主要领导后，受他的教益不少，深感他为人光明磊落，坦率诚挚，政治上紧跟党的方针政策，组织上强调团结，生活上随遇而安，不愿特殊，是一位随着时代发

展，不断追求进步，令我尊敬的长者。1984年后，我因调离省民革机关，与裴老见面的机会逐渐少了，当我从电视上看到裴老已被光荣批准参加中国共产党时，我为他的追求得到圆满解决而分外高兴。以后惊闻裴老以接近百颐上寿之年与世长辞，使我情不自禁地默哀追思，深感民革又失去一位品格高、作风正，同共产党亲密合作，参政议政出色的领导而久久不安，特赋七律一首，表我敬悼之忱：

走南闯北历半生，弃暗从明胆照人。

俯首为牛勤参政，毫釐入党倍光荣。

忆裴昌会

刘元璋

我得知裴昌会在渝逝世的噩耗，内心感到十分沉重和哀痛，一件 41 年前的往事，顿时涌上心来：1949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川东、川北分两路进入四川之际，在先叔刘文辉的领导下，我在雅安率部起义。就在这与大局攸关的关键时刻，12 月 23 日传来了裴昌会率其领导的第七兵团 10 万部队在德阳起义。作为同是起义将领，我们这一行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部消灭国民党残部于川西平原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使川、康两省基本实现和平解放，从而避免了川、康两省人民不必要的重大牺牲。这一行动，对于我们个人来说，是走上了弃暗投明的光明大道；对国家来说，使全中国彻底解放的日程更提早实现了。这一桩令人难忘的历史事件，使我常想到我与裴昌会在此之前虽无一面之识，然而我们都不谋而合地走在了一起，为国家、人民和自己作了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我们在内心上都感到十分自慰和欢快。正是基于这样的因素，解放 41 年来，我和裴昌会每次照面都有一种志同道合的亲切感，我们在交往中都能畅述己见，开诚相待，从无扞格，无论对于国家政策的理解和执行，都极易达成共识。因此，突闻噩耗，实难抑止哀痛之情。

裴昌会给予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对党的统战政策的笃信无疑和在遵行中的一片赤诚。我们都知道，胡宗南为了企图在川西负隅顽抗，加强了对部属的控制，将他的妻子儿女用飞机送去台湾以作人质。然而他从国家大局着眼，毅然率部起义。这其中虽

有时局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则是他对于党的统战政策由最初的心存犹豫卒至笃信无疑。起义后，对部队的整编调遣，以及对其工作的安排，他都愉快地遵从党的统战政策，从无异议。他曾说，他在川北行署工作时，胡耀邦曾对他讲：“革命胜利了，共产党威信高，群众都说共产党的好话，有意见也不愿提，而对你们他们没有顾虑，通过接触群众，你们可以听到真话，这对我们很有好处，这个作用有时是共产党员起不了的。”胡耀邦的这一席话，更增强了他对统战政策的坚定信念，更使他进一步认识到一个党外人士在国家事务中所起的作用，党是极珍视的。

裴昌会还经常提到，由于他对党的统战政策的威力，以及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民主协商制度的优越性的认识，他深受鼓舞，工作起来，总是信心百倍，精神振奋，在他所担任的公职中，对视察工作，研究调查，都是认真从事。他长住重庆，在历年视察中，对重庆的城市建设、环境保护、职工住宅、公安工作、中小学教育等，都提出过建议和意见，有的得到了重视和很好的解决。裴昌会的这种基于对统战政策的认识形成的工作态度和作风，对我目前担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的工作，多有借鉴，获益不少。

在党的统战政策的指引下，裴昌会作为民革的负责人，在这方面也作出了卓越的成绩。他在川北行署工作期间，对筹建川北区民革组织，作了积极的努力。当时南充地下民革在整建中受到当地封建帮会和地方势力的影响，难以处理好人事关系，裴昌会同原南充地下民革的几位负责人一起，开展了地区组织的筹建工作，于1952年1月正式成立了民革川北地区分部。目前，民革南充地区组织能作出较好的成绩，应该说与当年裴昌会的辛勤筹划所打下的基础是分不开的。

川北行署撤销后，裴昌会较长时间在重庆工作，对重庆民革工作无论是组织发展，人事安排和其他有关各项业务的推动，事

无巨细，都经常亲自过问和指导，今天民革重庆市的工作能在全省民革工作中成绩突出，我们更忘不了裴昌会的辛劳。我们每次见面研讨民革工作时，他总是十分谦逊地避谈个人功绩，而把成绩归诸于大家的共同努力。

裴昌会除致力于统战方面的工作外，在其所担任的行政领导中，那种积极负责，虚心学习，刻苦钻研的精神也是令人钦佩的。起义后，在党对他的信任和关怀下，他先后担任过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川北行署工业厅长兼管农林交通，西南纺织工业管理局局长，重庆市副市长，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他从不居高自傲，而是谦逊虚心，平易近人。他常说，我是出身军旅，对地方行政工作，完全是门外汉。41年来，他在工作中，即使在年逾花甲和古稀之年里，仍是不避劳累，坚持到实际工作中去，向技术人员学习，向工人学习，在实践中去摸索，在学习中去推动工作的开展，作到了以认真和负责的态度对待工作。他曾讲过这样一件事，他在担任川北行署工业厅长时，西南工业部化工局在南充新建一个火柴厂，造成了重复建厂。他认为他身为厅长，对工作的失误应作检讨。但当时担任行署主任的胡耀邦对他说，这个项目是上级批准的，不应由厅长负责，不让他检讨。裴昌会认为这件事虽作了如此处理，但自己作为厅领导，也是对工作的深入调查研究不够，要以此为教训，保持在工作中的清醒头脑。这也说明了裴昌会从不诿过、勇于负责、虚心求取进步的态度和工作作风。

裴昌会的行径，堪为我们称道和怀念者，远不止此，以上仅略述一二、以志哀思。裴昌会以93岁高龄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实现了他的宏愿，标志着他起义后40年来立身处事的总结，也为他历经风雨坎坷的一生，打下了一个完美的句号。